

從開元天寶社會的積富看長安生活的奢華

黃敏枝

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共計四十五年（七一—七五六）。在這段時期，可以稱得上是唐帝國最繁盛，社會最繁榮，政治最清明，民間最富庶的時期，這和安祿山引兵嚮關後的兵革連年，農村殘破，社會不安的情形，正好是最強烈的對比。昔時的歌舞昇平太平盛世，只能供後人的企羨和嚮往而已。

玄宗號稱是五十年太平天子，這實非誇大之辭，確是有他可以自豪的地方。他即位之初，勤於治道，去弊革訛（註一），崇儉去奢（註二），任用賢相能臣。因此，名臣輩出，以清貞位至宰相者三人，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而立於有唐三百年間（註三）。史稱宋璟善守文持正，姚崇善應變成務，而公忠體國則一。韓休爲相，玄宗爲之神形清減，宮中宴樂及遊獵，每問韓休知否？近臣曾進言，自以韓休爲相，陛下較前消瘦。皇帝則答說我瘦了，而天下却肥了（註四）。其他尚有杜暹、張嘉貞、源乾曜等名相；才臣則有裴耀卿、韋堅、宇文融、王鉷、楊崇禮、楊慎矜父子等；其中裴耀卿、韋堅有功於漕運之改革（註五）；宇文融、王鉷對於逃戶及田地之檢括等，建樹頗多，雖不免被聚斂之名，可是實未嘗有額外之徵（註六）。

在君臣努力之下，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玄宗時期，戶數和口數均分別創最高紀錄。天寶十三載（七二五），戶數高達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數則爲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註七）。這個數字，可以上追隋煬帝大業五年的盛況。因爲戶口大量增加，所以依戶數的多少來評定州郡等第的標準也大大的提高。永徽時，二萬戶以上爲上州；顯慶元年改

以三萬戶以上爲上州，到開元十八年三月，輒因爲太平時久，戶口日殷，而提高到以四萬戶以上爲上州（註八）。

戶口的殷盛，一方面顯示當時的生產和經濟，足以維持戶口的激增，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社會的富裕和豐給，而戶口的倍增，一向被認爲是太平盛世的象徵。不過，玄宗時期戶口的大量增加，和政府的大事檢括逃戶有很大的關係。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奏檢括偽濫逃戶及籍外贖田，並置有勸農判官。當時分遣以長安尉裴寬爲首者共二十九人，皆一時之俊彥，分往各地檢責田地並招携戶口，結果大爲成功，得逃戶及籍外田各八十餘萬（註九）。

田籍和戶籍都經過有效的整理，民勤其業，可耕地差不多都開墾了，這種情形，正像元結向代宗所奏稱的（註一〇）：

開元、天寶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內，高山絕壑，耒耜亦滿。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太倉委積，陳腐不可校量。因此，天寶十四載（七五五），每戶墾田面積約一頃六十餘畝（註一一），這個數字，雖然比不上隋煬帝大業中每戶墾田五頃餘的標準（註一二），但是也不能算少了。當時一戶的蓄積，正如杜甫在「憶昔」詩中所津津樂道的：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註一三）。

這種家富人足的盛世景況，正和天寶亂後杜甫所見到的：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人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寡妻妾（註一四）。

的情況豈不是成最強烈的對照。而和元結「春陵行」所說的「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結，意速行步遲。……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註一五），又何啻是天壤之別而已。

一室的蓄積有數歲之糧粟，至於一郡的積富又是如何呢？至德元載三月（七五六），李萼向顏真卿陳述清河之富庶。時清河號稱「天下北庫」，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註一六）。甚至於位於邊陲的靈右

也號稱天下最富庶者，自安遠門西盡唐境一萬二千里間閭閻相望，桑麻翳野（註一七）。難怪當時的涼州，其繁榮可能僅下於揚州、荊州，而在幽、廣之上（註一八），元稹「西涼伎」一詩可爲證明，詩云：

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樓下當壚稱卓女，樓頭伴客名莫愁；鄉人不識離別苦，更卒多爲沈滯遊。哥舒開府設高宴，八珍九醞當前頭。前頭百戲競撩亂，丸劍跳躑霜雪浮；獅子搖光毛彩豔，胡騰醉舞筋骨柔（註一九）。

這是地方富庶最好的寫照。因此，東城老父賈昌眼見張說領幽州時，每以長轡輓輻，車轡河間，薊州庸調綉布，駕轉連軌，輸於王府；而江淮綺縠，及巴蜀錦繡，則僅充後宮玩好而已；河湟屯田，除供邊食外，餘粟尙可轉漕太原倉（註二〇）。真的是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物價低廉，通典曾記載當時的物價云：

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西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麴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註二一）。而唐語林則更稱米每斗不過三錢而已（註二二），物價更是低了。因此，全漢昇先生在「唐代物價的變動」一文裏，即論及開天時期，是唐代物價最爲低落的時期。根據他的分析，其原因不外乎是物品供給充分，供過於求。因此，屢次有今歲普熟，爲免穀賤傷農，政府遂較市價提高十分之二三向百姓收購米粟。貨幣流通量的緊縮，及貨幣品質的優良，均是促成物價普遍降低的原因。因爲流通量小，就不敷交易及商業上的需要，而品質良好，其價值自會提高，遂造成物價的普遍低落（註二三）。

不僅是物價極爲低賤，社會秩序也最稱安定，商旅遠行數千里，可以不持寸刃（註二四），而且夾路酒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乘，租給商旅，倏忽數十里，稱爲驛驢（註二五），行不齎糧（註二六）。

在這種物阜民安，州縣富實，海內殷贍，府庫有陳腐之積，皇室左右藏也寶貨如山積的情況之下，大量的物質財貨還源源不絕的輸入長安。尤其是自從開元二十四年裴耀卿對於漕運的種種改良以後，將過去的長途運輸法改爲轉般法（分段運輸法），江南的財富，三年之內輦入京城，高達六七百萬石，並將義倉的粟，廻造爲米，轉運京師。天寶元年三月，韋堅以陝

郡太守兼水陸轉運使，穿廣運潭，以利舟楫轉漕長安。韋堅對於漕運的改良，比裴耀卿更勝一籌。將江南之租米迴造爲布（布比米更輕更便利），甚而改以江南之輕貨輸入京師。如廣陵郡（揚州）船載廣陵所出的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潤州，今鎮江）船載京口綾衫段，晉陵郡（常州）船上是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爲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爲瑇瑁、眞珠、象牙、沉香（註二七）。這些奢侈品之輸入長安，對於長安的生活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運河的改善，不僅使南北交通大爲利便，商旅往來頻繁，促進國內商業的繁榮，就是對外貿易也趨於極盛。廣州是唐中葉以前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當五、六月南海正吹着西南風時，阿拉伯、波斯、婆羅門、崑崙等船，到達珠江流域，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中尤以師子船最大，高六七丈。十、十一月南海吹東北季風時，蕃船又滿載中國商品，紛紛揚帆而歸。因此，從五月到十月這段期間，蕃船就羈留在中國。玄宗時代，廣州設有市舶司以管理對外貿易，並且有特定地區稱爲蕃坊，以供外國人居留，當時居留的外國人約在十萬左右。

天寶年間，律師鑑眞大和上東渡日本時，曾目睹廣州國際貿易的發達，珠江內蕃舶擁擠，珍貨山積，廣州都督的威嚴竟與天子無殊，而由長安北衙（南衙是一般官僚機構所在地，北衙則屬宦官）派遣來的宦官，即所謂宮市使，也在廣州大量搜購御用品，以供玄宗及楊貴妃豪華生活之用。宮市使也同時替長安的貴族富豪作經紀人，譬如崑崙奴，是當時貴族生活的特色，即是由宦官在廣州的黑人奴隸市場買得的，然後再轉賣到長安，鑑眞和上曾親見耳聞（註二八）。

就上文所論及的，長安爲當時唐帝國的首都，同時也是國內外交通的樞紐，絲路的起點，及皇親國戚貴族豪家所萃聚的地方，胡人及胡商也紛紛聚居於此，當時長安人口可能有一百萬，胡人則約一萬人左右。

長安的商業區有東市（隋稱都會市）西市（隋稱利人市）二個區域，市區盛設邸店，兼營旅館業和倉庫業。東市以貴族達官之邸宅居多，西市則胡人和胡商居多，貿易之盛，又在東市之上（註二九）。

西市以胡姬胡肆爲特色，李白「少年行」所謂的「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

中」(註三〇)。至於以中國古典詩文教養成的歌姬舞姬所聚居的平康坊，則在東市西北，故稱爲「北里」。此坊是一般長安俠少及新科進士和舉人最樂於一遊的地方，向被稱爲「風流薊澤」(註三一)。

長安既爲帝京，又值歌舞昇平，太平盛世時候，一般士庶生活的窮奢極侈，本是極自然之事，尤其是楊氏姊妹昆仲得勢之後(開元二十八年宣召楊玉環入宮，天寶四載正式冊封爲貴妃，禮制侔於皇后)，玄宗和貴妃一心一意專門於生活享受方面，奢靡成風，民間也起而效尤，競奇鬪富，耻居人下。

長安每屆春天，盛於遊賞。仕女們自正月半以後，喜乘車跨馬，結帳於名園或郊野，競設探春之宴(註三二)。因此園林樹木了無閑地，學士蘇頲應制詩即形容遊春之盛況空前，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註三三)。

長安一般俠少，對於遊春相當講究。他們通常喜歡結朋引伴，各備花馬，飾以錦綉金絡，俗稱看花馬，並轡於花樹下來，使僕從執酒皿隨後侍候，一遇好園美圃，就駐馬飲宴(註三四)。此外，尚有俗稱裙幄者，即是遊春時，遇名花就設席藉草，以紅裙遞相插掛，以爲宴幄之所(註三五)。一般貴家子弟，遊春的氣派甚大，隨行載有油幕，或遇陰雨，則以幕覆之，遊興不減，盡歡而歸(註三六)。楊氏子弟，每遊春之際，以大車結綵帛爲樓，載女樂數十人，聲樂前引，號稱移春檻，場面更是壯觀，長安豪民貴族皆起而效尤，蔚爲一時風氣(註三七)。

除了遊春外，仕女們又有鬪花的習慣，以奇花多者爲勝，長安王士安，每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便春時鬪花之用(註三八)。玄宗以後，唐人對於牡丹的喜愛更是日甚一日。一到暮春三月，傾城出動，大約在三月中旬前後，正是「花開花落三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註三九)的觀賞牡丹。開元中，中書舍人李正封詠牡丹的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已傳唱京邑(註四〇)。當時米一斗不過十五錢，而買一棵牡丹却須要數十千錢，天寶年間進士柳渾「牡丹」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棵」(註四一)應是實情。

當時長安觀賞牡丹最好去處，是靠近曲江池進昌坊的大慈恩寺。三月中旬，五六百朵牡丹花爭奇鬪艷的迎風招展。時人

對於牡丹的愛護也是呵護備至，楊國忠即以百寶粧飾欄楯，或用檀香作花欄（註四二）。

長安城內東南隅之曲江池，開元時代是首屈一指的遊春所，正如杜甫「麗人行」一詩中所道及的「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三月三日是上巳節，唐人流觴曲水，臨清流而賦詩。曲江遊賞，即盛于開元之末（註四三），尤其是新科進士之曲江宴，移樂遊舟，士庶傾城縱觀，更是盛況空前。

春天時，長安人對於遊春之興是樂而不疲的，賞名花，遊名園，生活確是多采多姿。一到夏天，氣候酷暑，一般人大概都躲在屋裡而不喜歡外出，但是對於一般富豪子弟，他們更用一切的方法來避暑。長安富家子弟劉逸、李閑、衛曠諸人，家世巨富，疎財仗義，喜好延接四方賓客。每遇暑天，即於亭子邊以錦綺結為涼棚以避暑，並召長安名妓，宴飲作樂，號稱避暑之會（註四四）。還有比結棚避暑更勝一籌，稱為冰山避暑者。楊氏子弟，每於宴席周圍，取大冰命匠琢為山環繞之，致使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甚而挾纊者，其驕貴如此（註四五）。其中最為奢侈的享受，可能要數玄宗所起的涼殿和王鉞的自雨亭子，而自雨亭恐還略勝一籌。涼殿是於座後水激扇車，故雖在盛暑，而座內含凍（註四六）。至於王鉞，因附李林甫而得勢。鉞善於理財，歲進羨餘百億萬，以供玄宗恩賞之用，而為帝所寵信。天寶九載（七二二），以京兆尹身兼二十餘使，威權轉盛，林甫亦畏避之。其子準，以鬪雞供奉，每譴林甫子岫，岫常下之。十一載，以弟錁連及謀反，鉞亦賜死（註四七），家財籍沒，縣官簿錄其太平坊宅第，數日不能遍。宅內有所謂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雖盛夏猶如高秋（註四八）。根據向達先生的考證，自雨亭及涼殿的建造技巧，均源出於西域（註四九），這是唐帝國深染胡風的又一證明。

冬天嚴寒時節，一般貴戚取暖的方法例不向火。楊國忠有肉陣之設，藉人氣以相暖（註五〇）；申王有妓圍之置，使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註五一）；岐王則惟於妙妓懷中揣其手以保暖，稱為香肌暖手（註五二）。

長安貴族富豪奢侈的生活，尚不只這些。晚上有特製的燭奴，以龍檀木雕成燭奴童子，衣以綠袍，使執畫燭，環列於宴席之側，首開此風的是申王，以後達官貴戚之家皆爭相仿效（註五三）。寧王則以木雕矮婢，各執華燈，稱之為燈婢（註五四）。

，與燭奴實同名異。

當時長安，富商麇集，其中以王元寶、楊崇義（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郭萬金等更是國中巨豪。王元寶爲天下大富，李元獨異志卷中稱述其豪富云：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者，以有元寶字也。

因此，玄宗曾說：「我聞至富敵至貴，朕天下之主，而元寶天下之富故也」（註五五）。王元寶既被公認爲天下大富，其居宅最稱奢麗，故以富窟稱呼。其居第之華美如下：

王元寶，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銀疊爲屋，壁上以紅泥泥之，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檀爲軒檻，以砥砢瑩地面，以錦文石爲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其泥雨不滑也。四方賓客，所至如歸，故時人呼爲王家富窟（註五六）。

除了王元寶等富商外，尚有許多豪商聚居在京城。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不能指明的罪名，或因無繼承者，而沒收京兆外商任令方資財六十餘萬貫（註五七）。這個數字約等於第九世紀晚期蘇州（東南首富之區）一年的歲入（註五八）。除了有中國富商外，尚有以經營珠寶等名貴物品的胡商，數量也不少，而且大都以富貴聞名，因此李商隱義山雜纂不相稱條中之一卽是「窮波斯」（註五九）。

楊氏昆仲五家之第舍，則僭擬宮禁，一堂率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己者，輒壞復造，務以奢侈相夸，土木之興，永無止息（註六〇）。當然，居室建築之宏麗奢華，並非此時期之特有現象。開元之前，制度尙能保持，但是中宗時官中書令之宗楚客，其第宅之靡麗，連貴盛之太平公主亦望之而興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註六一）。安史亂後，制度漸被破壞，有「木妖」之說，代宗時官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京師之第舍，尤稱宏美（註六二）。甚至連馬廐也相當講究，李衛公靖的家廟竟只能淪爲楊國忠的馬廐。豪貴階級對於車馬的服飾也極盡奢華之能事，以金翠珠玉飾之，費至數十萬貫。鄭處

誨明皇雜錄云：

貴妃姊妹，競飾車服；爲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不啻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爲勒，組繡爲障泥（註六三）。

關於馬飾華麗方面，李樹桐先生著有專論（註六四），此處從略。

長安生活的奢靡，我們從喪葬的情形，也可略窺一二。玄宗一朝，王公百官競爲厚葬，窮極侈巧，以新奇闢麗取勝；歸葬時有路祭，沿途設祭，每半里一祭，連續相次。路祭時，均於路旁設帳幕，中有祭盤，設假花果及粉人粉糧等東西。封演特別指陳當時的道祭情形云：

玄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粉糧之屬（註六五）。

當然，厚葬風氣並非始自玄宗，而最奢侈時期則屬安史亂後，場面之壯觀和豪華，更是令人嘆爲觀止（註六六）。

有關玄宗一朝喪葬的情形，最好的材料莫過於白行簡的「李娃傳」，傳中描述極爲生動。當時長安有東西二市凶肆，以傭凶器爲業，互爭勝負，相約以所傭之器，陳列於天門街，以校優劣，比賽的消息不逕而走。卽期，長安仕女聚觀者達數萬人之多，四方之士也盡趨往，巷無居人，可謂空前轟動。自早及午，兩凶肆歷舉輦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最後則以唱輓歌爲壓軸，以歌者聲音動聽的程度來別勝負（註六七）。

玄宗一朝，長安人的生活確是日趨奢靡，一般衣食住行的享受，都極盡鋪排之能事，聳動聽聞，甚而連死時也要大事鋪張，死出風頭一番，靡費不貲，難怪要引起有識之士的反對，而須要明令禁止了。開元二年，下詔禁止王公百官服用金、銀、珠、玉、錦、繡等，並停兩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註六八）。同時又詔禁富豪喪葬越禮，明器儀仗皆有定制（註六九）。開元二十九年，敕明器墓田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金銀銅錫，衣不得用羅繡，祭盤不得做假花果及樓閣，連墓田的高度也受限制（註七〇）。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些規定和命令，只是具文而已，可能不會有多大效果的。

開元之際，長安人士喜好的娛樂甚多，本文僅討論鬪雞一項，其他從略。從長安人對於鬪雞的喜好和行爲，也可略窺當時生活的無虞和社會的富裕。

唐代君主雅好鬪雞者甚多，尤以玄宗爲甚，或以帝生之年爲酉，而雞屬酉。陳鴻「東城老父傳」所言長安鬪雞之風，可說是最爲詳瞻、生動和逼真。玄宗在藩邸時，就很欣賞民間清明節鬪雞。即位後，設雞坊於兩宮中，養有雄雞千餘數，均具金毫、鐵距、高冠、昂尾者。並選六軍小兒五百人專門負責馴養，當時賈昌即充五百小兒長，號爲神雞童，獲玄宗寵信互四十年。金帛之賜，日至其門，難怪時人爲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安千里外，差夫持道輓喪車（註七一）。

這可真是「鬪雞事萬乘，軒蓋一何高！」（註七二）詩人李白也感慨萬千的說道：

駕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鬪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註七三）。一般豪富之家，則多蓄雄健之雞，甚至有傾家蕩產，以償雞值者，都中男女均以弄雞爲事，窮人無錢買雞，則以弄假雞爲樂。鬪雞須下賭注，長安俠少，日以醉飲倡樓鬪雞爲活（註七四）。

玄宗一朝，是唐帝國的全盛時期，出現了史上少見的太平盛世，對外的開拓也無往不利，正是「烽燧不驚，華戎同軌」，四夷款塞，膜拜於丹墀之下，開元天寶之盛，爲漢宋所不及。

開元天寶之盛，見於紀傳者，如兩唐書紀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李德裕明皇十七事，次柳氏舊聞，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等等；及詩歌者如蘇頲、張說、李白、杜甫、張九齡，而尤以張祜所詠獨多，皆爲人所未嘗及者（註七五），陳鴻及白居易之長恨歌傳，更是令人低徊不已。

開元天寶時期，以朝廷爲中心的唐文化，遠被四鄰，尤其文化的東傳日本，影響更是深遠。和開元天寶同時期的天平文

化，到如今還是被保存於正倉院。而最爲人所樂道的玄宗與楊貴妃，正和同時的聖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也爲日本人所羨稱一樣，東西媲美。

唐代的樂舞及百戲也於此時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崔令欽的教坊記即完成於此時（目前有任半塘箋訂本最稱完善），盛唐二位代表詩人李白、杜甫也是這時期的產物。

正當唐文化各方面的成就，普臻成熟達到它最光輝的巔峯狀態時，帝國的富庶也創最高峯，身爲帝國首都的長安，可稱得上是當時國際第一大會，其社會的繁榮，生活的豪奢自不待言。本文由社會的積富來論及長安的生活，雖然無法做整體的敘述，而僅是重點式的討論；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長安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娛樂，甚至一般節令慶典（註七），都十足反映出長安人生活的生動有趣，多采多姿，及享樂主義的盛行。

附 註

註一：王謙，唐語林（世界書局，臺北）卷三「夙慧」條，頁一一四。

註二：資治通鑑（世界書局，臺北；以下簡稱通鑑）卷二一一，開元二年七月條，頁六七〇二。

註三：王夫之，讀通鑑論（世界書局，臺北）卷二二「唐玄宗」，頁四五〇。

註四：通鑑卷二二三，開元二十一年三月條，頁六八〇一。

註五：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史語所專刊，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初版，臺北），第三章「大唐帝國的極盛與運河」，頁三二—四〇。

註六：讀通鑑論，卷二二，頁四六五。

註七：這個數字是根據舊唐書卷九「玄宗」紀。關於唐代的戶口，這裏僅列出簡表，就可以一目了然。

年 代	西 元	戶 數	口 數	備	註
永徽三	652	3,800,000	37,140,000	唐會要八四，是年七月，戶部尚書高履奏。	
神龍元	705	6,150,000	37,140,000	通鑑二〇八，冊府，會要略異。	
開元一四	726	7,069,565	41,419,712	舊唐書八，會要八四，冊府戶數略異。	
開元二二	734	8,018,710	46,235,161	據唐六典，會要八四戶數同，但列在二四年。	
天寶元	742	8,525,763	48,909,800	舊唐書九，通鑑二一五。	
天寶十三	754	9,619,254	52,830,488	舊唐書九。	
天寶十五	755	8,914,709	52,919,309	通典七。	
至德元	755	8,018,710		會要八四。	
乾元三	760	1,933,174	16,990,386	通典七。	

註八：王溥，唐會要（世界書局，臺北）卷七〇「量戶口定州縣等第例」，頁二二二。

註九：通典（新興書局，臺北）七，典四一上「歷代盛衰戶口」；又參見通鑑卷二二二，開元九年正月條，頁六七四四—四五。

註一〇：元結，「問進士」，時永泰二年，官通州，見欽定全唐文（文友書店，臺北），卷八十頁，頁四八八三上。

註一一：通典，典一六下「田制下」。

註一二：同上，典一五下「田制下」。

註一三：杜甫「憶昔」詩，全唐詩（新興書局，臺北）四函一冊，頁一二五八上。

註一四：同上，「無家別」，頁一二三七下。

註一五：元結「春陵行」，全唐詩四函六冊，頁一四五二下。

從開元天寶社會的積富看長安生活的奢華

關於天寶亂後，農村崩潰的情形，請參閱：

(1) 黃穀仙：天寶亂後農村崩潰之實況（食貨一卷一期，頁十四—十九，民二十三年十二月）

(2) 黃穀仙：天寶亂後唐人如何救濟農村（上下）（食貨一卷十一期，頁十六—三〇及頁六—十三，民二十四年五月、九月）

註一六：通鑑卷二一七，至德元載三月條，頁六九五七。

註一七：通鑑卷二一六，天寶十二載五月條，頁六九一九。

註一八：嚴耕望，唐代篇，中國歷史地理（中華文化出版社，民五十七年七月三版，臺北）所收，頁四四。

註一九：元稹「西涼伎」，全唐詩六函十冊，頁二四四五下。

註二〇：陳鴻，東城老父傳，唐人傳奇小說（世界書局，臺北）所收；又參見唐語林卷三「夙慧」條，頁一一四。

註二一：通典七，典四一中「歷代盛衰戶口」。

註二二：同註一。

註二三：全漢昇，「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頁一〇九—一一。

註二四：同註二一。

註二五：同前註，此為開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時事。

註二六：同註一。

註二七：同註五。全漢昇先生即認為開天時期帝國極盛，即是拜運河之賜。並參考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葉六一七。又通鑑卷二二五，天寶二年三月條，頁六八五七—五八也可參考。

註二八：塚本善隆編，世界的歷史4（中央公論社，一九六八，東京），唐とインド，頁四〇二—〇六。

註二九：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七。

註三〇：李白「少年行」，全唐詩三函四冊，頁九三七下。

註三一：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唐代叢書）新興書局，臺北」所收，「風流薮澤」條，頁一一五下。

註三二：同上，「探春」條，頁一二八上。

註三三：同上，「遊蓋飄青雲」條，頁一二二上。又參見唐語林卷三「文學條」，頁

註三四：同上，「看花馬」條，頁一一五下。

註三五：同上，「裙幘」條，頁一二三上。

註三六：同上，「油幕」條，頁一二三上。

註三七：同上，「樓車載樂」條，頁一二四下。

註三八：同上，「鬪花」條，頁一二三上。

註三九：白居易新樂府「牡丹芳」，全唐詩七函一冊，頁二四九七下。

註四〇：松憲雜記（唐代叢書所收），頁一〇一上。

註四一：柳渾「牡丹」詩，全唐詩三函八冊，頁二〇〇下。

註四二：王仁裕，前揭書，「百寶欄」條，頁二六上一下。

有關唐人對於牡丹的喜好，請參考李樹桐先生「唐人喜愛牡丹考」一文，載氏著唐史新論（中華書局，民國六一年四年初版，臺北）。

本文有關牡丹即參考李先生一文而成的。

註四三：王定保，唐摭言（世界書局，臺北）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頁二九。

註四四：王仁裕，前揭書，「結棚避暑」條，頁一二〇下。

註四五：同上，「冰山避暑」條，頁一一七下。

註四六：王謙，前揭書，卷四「豪爽」條，頁一二〇。

註四七：舊唐書卷一〇五，本傳，葉十三b—十六b。

註四八：封演，封氏聞見記校證（趙貞信校，哈燕社影印，民二二年）卷五「第宅」條，頁二三—二四。

註四九：向達，「唐代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國風半月刊三卷十一期，民二二年六月）。

註五〇：王仁裕，前揭書，「肉陣」條，頁一二二下。

註五一：同上，「妓圍」條，頁一一六上。

註五二：同上，「香肌暖手」條，頁一一五下。

註五三：同上，「燭奴」條，頁一一五上。

註五四：同上，「燈婢」條，頁一二八上。

註五五：以上均見李元，獨異志（唐代叢書所收）卷中。

註五六：王仁裕，前引書，「富窟」條，頁一一八上—下。

註五七：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葉三b。

註五八：D. 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ang Dynasty*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0, 2ed.), pp. 163—

64.

註五九：李商隱，義山雜纂（唐代叢書所收）「不相稱」條，頁二七五上。

註六〇：新唐書卷七六「楊貴妃」傳，葉二七b。

註六一：張族為，朝野僉載（叢書集成簡編）卷三，頁三七。

註六二：黃現璠，唐代社會概略（商務史地小叢書，民國二五年三月初版，上海），頁二三—一四五；傅秀實師，「唐人的生活」，食貨復刊

四卷第一二期民國六三年五月一日）頁七，抽印本，。

註六三：此處轉引黃現璠，前揭書，頁一三七—一四五。

註六四：李樹桐，「唐代馬的裝備與裝飾」，唐史新論頁二八—三一一，。

註六五：封演，前揭書，卷六頁三六「道祭」條；又唐語林卷八頁二七二「補遺」，也可參考。

註六六：同上。

註六七：白行簡，李娃傳，唐人傳奇小說所收。

註六八：宋敏求，唐大詔令集（適園叢書）卷一〇八「禁奢侈服用敕」條，及卷一〇九「禁斷錦繡珠玉」條。

註六九：同上，卷八十「禁喪踰禮制」條。以上諸文請參看黃現璠前揭書，頁一三七—一四一。

註七〇：唐會要卷三八「葬」條，頁六九三—九四。

註七一：陳鴻，東城老父傳。

註七二：李白「白馬篇」，全唐詩三函四冊，頁九三三上。

註七三：李白，「古風」，同上頁九一九下。

註七四：羅香林，「唐人鬪雞戲考」，唐代文化史研究（人人文庫）。及傅秀實師前引文。

註七五：洪邁，容齋隨筆五集（一）（萬有文庫叢要，民國五十四年二月台一版，商務）卷九「張祐詩」條，頁八九。

註七六：田中克己，「玄宗と楊貴妃の世界」一文是有關當時年中行事的最好參考資料，文載世界の歴史第六冊（筑摩書房，一九六九，東京），頁二〇六—二〇八。劉伯驥，唐代政教史（中華書局，臺北）第三章「社會風俗」，頁八五，亦可參考。